

碑刻文献研究的几个问题

毛远明

〔摘要〕 碑刻文献材料丰富,所涉内容广泛,真实性强,产生时间、地点可考,具有重要的文史研究价值。过去的研究曾取得很多成果,但研究缺乏系统性、理论性和科学性。目前应该注重碑刻文献的全面搜集和科学整理,努力构建碑刻文献学理论,全面利用碑刻文献分专题进行系统的、科学的、深入的研究。

〔关键词〕 碑刻文献 整理 研究

一、碑刻文献研究价值的基本认识

碑刻文献属于出土文献范围,具有不同于传世文献的独特研究价值,与其他出土文献如甲金文、简帛、敦煌写卷等在内容、形式、性质、用途等方面都有所不同,其文献价值是巨大的,是其他文献不能代替的。凡山川、城池、宫室、桥道、坛井、神庙、家庙、古迹、冢墓、寺观,随处立碑,土风、灾祥、制度、功德、宗教,无所不涉,对于考察古代山川城池,风土民情,名宦乡贤,嘉言懿行,典章制度,政教布施等有特殊的意义。清代金石学家王昶曾说:“宋欧、赵以来,为金石之学者众矣。非独字画之工,使人临摹把玩而不厌也。迹其囊括包举,靡所不备。凡经史小学,暨于山经、地志、丛书、别集,皆当参稽会萃,核其异同,而审其详略。自非轮材末学能与于此。且其文亦多瓌伟怪丽,人世所罕见,前代选家所未备。是以博学君子咸贵重之。”^①

目前学界已经充分认识到,必须将出土文献和传世文献有机结合,互相补充,互相映衬,互相发明,互相支撑,去解决历史上留下的疑难和困惑,去发现尚未被前人注意

^① 王昶《金石萃编》,中国书店据1921年扫叶山房本影,1985年。

的新问题;必须打通学科壁垒,充分利用不同的出土文献,以拓宽研究的领域,增强研究的可信度,在更高层次,更深领域观察和思考问题,这是值得欢迎的。

碑刻文献研究的价值大,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:

(一) 材料丰富

我国碑刻文献产生的历史悠久,与甲骨文同时代的石刻铭文已有少量出土;战国时期产生的《石鼓文》,已经达到相当高的水平。只是由于石质材料易脆,先秦以前的碑刻材料保存下来的甚少。东汉以后,刻石之风大盛,为后世留下了十分丰富的碑刻文献。碑碣、石阙、摩崖、墓记、表铭、文告、契券、画像题字等材料,已趋于齐备,碑刻的形制体式也趋于定型。魏晋以后,由于禁止立碑,碑碣转入地下,从而促使了墓志的发展;南北朝佛教的繁荣,促成了新的碑刻文献材料造像题记的产生。初步统计,有目可考的汉魏六朝碑刻约有3000通。^①隋唐时代是碑版铭刻的繁荣期,其数量远比汉魏六朝丰富,而且多丰碑巨制。举几个数字,王启祚《隋代墓志铭汇编附考》收录隋代墓志约700通,毛汉光《唐代墓志集说附考》收录唐代墓志1800余种;周绍良、赵超《唐代墓志汇编》依据拓片收录《全唐文》不收的唐代墓志3600余方,其续编又收录1564方。除去部分重复,数量也是很可观的。这还不包括以下几种情况:一是不少著录碑刻文献的著作,由于所载碑刻分量不大,没有统计;二是大量已经出土,但尚未公布的碑刻材料;三是有的碑刻因原物或拓本失传,只在传世文献如文集、丛书、类书中保存下来;四是随着考古新发现,还会有大量新的碑刻材料出土。如果把这些因素都考虑进去,其数量无疑十分庞大。

宋代以后一直到现代,碑刻铭文的制作从来没有间断过,而且时代越靠后,碑刻实物或拓片保存下来的就越多,越完整。只是受崇古思想的影响,宋代以后,特别是元代以后的碑刻,人们不大重视,其数量尚不清楚。

中国上下几千年,碑刻数量到底有多少?由于材料比较散碎,至今还没有进行过系统的清理,有待学人全面搜集、著录、整理。不过,著录历代碑刻的大型著作仍然不少,其著录方式包括跋尾式著录、摹录铭文、楷书逐录碑文、著录碑目、拓片及图录等。比如:

王昶《金石萃编》,材料采自上古至辽金,金石兼收,而重在石刻,共收金石铭刻1500余件。该书刊布后,不少学者作了续编、补正工作。如陆耀遹《金石续编》二十一卷、王言《金石萃编补略》三卷、方履篋《金石萃编补正》四卷。还有未刊行的,如严可均

^① 毛远明《汉魏六朝碑刻目录提要》,线装书局即出。

《平津馆金石萃编》二十卷,又补编不分卷,稿本藏中国国家图书馆;陆心源《金石萃编补》二百卷,包括《萃编》以后发现的金石 2000 余件,惜未刊行。

陆增祥《八琼室金石补正》一百三十卷,《目录》二卷,《金石札记》四卷,《元金石偶存》一卷,除了少量汉镜铭文,绝大多数是碑铭,在《金石萃编》的基础上,新增碑刻 2000 多种。其次子陆继辉曾编辑《续补正》六十四卷,惜未刊行。刘承幹刊有《希古楼金石补正》十卷,还有未刊稿《金石萃编续补》一百三十卷,其所收碑刻数量也不在少数。

北京图书馆金石组编《北京图书馆藏中国历代石刻拓本汇编》,各类碑刻兼收,按时代编排,分装 101 册,公布历代碑刻拓片 20000 种以上,这是我国目前最大的一部通代碑刻拓本图录汇编。吴钢、吴树平主编《隋唐五代墓志汇编》,收录传世和新出土的墓志 5000 余方,制成图录出版。

还可以从碑目大致了解历代碑刻数目。《寰宇访碑录》收录上起三代,下迄元朝的碑拓材料 7853 件。后来不断有人补录和续补,将这一体系的石刻目录汇总起来,收录石刻共约 15000 件以上。封建时代,碑石、拓片散藏于各家,采访不周者有之,秘而不宣者有之,其漏脱是完全可能的。民国以来,地不爱宝,又有大量石刻,特别是墓志出土。保守估计,已知清代以前制作的碑刻,应该在 10 万件以上,而且今后一定还会继续大量出土。如此丰富的材料,是我们从事各学科领域研究的宝库。

（二）反映的内容广泛

我国的各种文章样式在碑刻中基本齐备,而以墓碑、赞颂碑、祠庙碑、墓志铭、造像记为主,内容涉及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,包括了政治、经济、军事、历代职官、古代地理、民族融合、人口迁移、姓氏名号、世系谱牒、典章制度、风俗习惯、思想意识、道德观念、天文历法等广泛的领域。尤其是很多材料是其他文献没有记载的,如幽埋冢墓石刻、造像题记、刻经记、经幢等,就更加珍贵。文献内容的丰富、广泛,能为利用石刻从事科学研究提供十分广阔的空间。研究者可以根据需要,从不同的分支学科、不同的角度切入,进行断代、分域、分项、分专题研究,其研究的前境十分广阔。

特别是碑刻中有关地理、职官、姓氏、世系、宗教、经济、礼乐、刑政、民族等方面的很多材料,是传世典籍,甚至其他出土文献无法获得的。清叶昌炽曾说:“撰书题额结衔,可以考官爵;碑阴姓氏,亦往往书官于上;斗筲之禄,史或不言,则更可以之补阙。郡邑省并,陵谷迁改,参互考求,瞭于目验。关中碑志,凡书生卒,必云终于某县某坊某里之私第,或云葬于某县某邨某里之原,以证《雍录》、《长安志》,无不吻合。推之他处,其有资于邑乘者,多矣。至于订史,唐碑之望族,及子孙名位,可补《宗室》、《宰相世系表》;建碑之年月,可补《朔闰表》;生卒之年月,可补《疑年录》。北魏造像记,可补《魏书》·

释老志》;《天璽纪功》、《天发神谶》之类,可补《符瑞志》;投龙斋醮,五岳登封,可补《郊祀志》;汉之孔庙诸碑,魏之《受禅》、《尊号》,宋之道君五礼,可补《礼志》。唐之令长新诫,宋之慎刑箴、戒石铭,可补《刑法志》。”^①他的认识是对的,只是碑刻文献所涉领域还远不止此,凡文史研究,无不可以大量资取。

(三) 真实性强

传世典籍一般都曾经后人整理,书籍辗转传抄翻刻,不大可能保持原貌,尤其是文字的变动更大。无关紧要的改动,问题不大,如果改动关键的地方,影响到对内容的理解,甚至对一种思想观念的解释,问题就大了。举一个出土材料的典型例子。今本《老子》十九章“绝圣弃智,民利百倍;绝仁弃义,民复孝慈;绝巧弃利,盗贼无有”,一直被视为道家对儒家的激烈反对。但是郭店楚简《老子》却作“绝智弃鞭(辨),民利百倍;绝巧弃利,盗贼无有;绝伪弃虑,民复季子”,“圣”、“仁”、“义”,都不在绝弃之列。显然今本是在儒、道两家强烈对抗的战国晚期,老庄后学所改。^②

碑刻文字一经上石,本身就不易改动,碑志在出土之前,深埋地下,无人篡改,一如地下档案。出土之后成为最原始的文献资料,属于一次性文献。因此,其真实性特别强。虽然也有翻刻和伪刻,但是就文献而不是就文物的角度考虑,好的翻刻一般不怎么失真,尤其是内容一般不会有大的变动,从事文史研究,用不着排斥。至于伪刻,只要经过认真研究、细致考证,是可以剔除的。前人在这方面曾经做过很多工作,有不少成果可供利用,有很多经验可以借鉴。拓本也有先后、精粗之别,有的拓本还可能经过后世的挖洗补缀,但改动不会很大,而且可以通过各种拓本进行校勘。研究材料的可靠性,为研究结论的可信性提供了重要保障。

历代碑刻铭文,有一部分在传世文献中有记载,我们将碑刻原物或者拓本与之比勘,触处可见两种文献的相异之处,传世文献的弱点便暴露了出来。清顾炎武《日知录》取唐石经与传本《仪礼》对勘,补正了传本的多处讹脱。阮元作《十三经校勘记》,使用了大量的石经材料。我们曾将《庚子山集》同出土的两通碑志对校,发现传世众本衍脱错讹甚多。^③再调查《全六朝文》、《全唐文》、《文苑英华》等,发现彼此差别都很大。

利用大量碑刻材料,不仅可以重编全两汉文、全魏晋六朝文、全唐文、全宋文等,可以对历代文人别集进行辑佚,而且还可以对已经编纂成书的典籍进行详细校勘,为文

^① 叶昌炽著,柯昌泗撰《语石异同评》卷6,中华书局1994年版。^② 裘锡圭《关于〈老子〉的“绝仁弃义”和“绝圣”》,《出土文献与古文字研究》第一辑,复旦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。^③ 毛远明《石本校〈庚子山集〉二篇》,《纪念西安碑林九百二十周年华诞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》,文物出版社2008年版。

史研究提供更加完整、真实、准确的文献材料。

（四）产生时间、地点可考

碑刻产生年代一般是自足的，镌刻时间是碑刻铭文的一个要素，一般都要明确列出。少数碑刻自身没有明确的镌刻时间，但是可以利用与之同时出土的相关文物、镌刻工艺、书法风格、文字书体，考察碑刻出土的环境等，作出比较准确的判断。还可以在文献本身的字里行间寻找蛛丝马迹，考察铭文语言、附刻文饰等方面的时代特征，进而作出判断。根据我们接触碑刻文献的经验，完全不能断代的材料是很少的。

碑刻实物产生的准确时间、地点，不仅为鉴定器物、鉴别真伪减少了许多麻烦，而且更重要的是能够保证对文献材料的准确利用，以及根据研究的需要作出断代、分域的、专题的研究。

二、碑刻文献研究存在的主要问题

碑刻文献著录、整理与研究的历史比较悠久，司马迁著《史记》，开始著录秦刻石。南朝梁元帝《金楼子·著书篇》载，他曾编辑《碑志》十帙，共一百卷，可惜该书并没有传世。内容、体例均无考。

唐代韦述等史家不仅开始搜集、著录金石碑版，而且将碑铭运用于史学研究。《旧唐书·经籍志》著录《诸郡碑》一百六十六卷，《杂碑文集》二十卷，只是这些碑铭均未能流传下来。敦煌出土文书中也有辑录碑志的材料。如《李氏造窟功德碑》、《张淮深碑》、《常何墓志》，都有写本传世。这些材料虽然不著编者姓名，但表明唐代已有学者集录碑版铭文。

大量著录并考证石刻的学者首推欧阳修，他的《集古录》首创跋尾体例，为碑刻文献的研究奠定了良好基础。继起者有赵明诚《金石录》、洪适《隶释》，他们都是学问大家，其著作影响甚大，金石之学很快成为学术热点，而且代代相传。特别是有清一代，凡学术成就较大者，大都曾研究金石。表现为研究的学者多，研究的领域广，取得的成果比较丰硕。只是学界研究的目光主要集中在字形学、书法学、历史考证方面。其成果形式多随兴感发式的跋尾或者笔记杂录，只是就具体碑石点染一二。真正有分量、有巨大影响的研究专著事实上并不太多。研究的广度、深度和成果的社会影响都不能与甲骨文、金文相比，甚至不能与简帛文献、敦煌文献相比。碑刻文献的丰富性、研究价值的重要性同碑刻研究的成果现状相比，实在很不相称，不能令人满意。

碑刻文献的整理与研究存在的问题比较多，要做的事情也比较繁。我们认为以下

三个方面的问题亟待解决:

(一) 材料散碎、原始,搜集、整理不够

过去的研究没有明确目标,没有具体策划,缺乏理论指导。首先表现在对碑刻文献原始资料的清理不够,虽然学界从不同角度,不同层面,不同领域,以不同的方式,对碑刻文献作了部分搜集、分类、综合整理工作,但并没有全面展开。学界面临的现状是碑刻文献的家底不清,情况不明,心中无数,既难以对这项文献作出准确科学的评估,更难以对材料的科研内涵进行有效的发掘。我们觉得,目前亟须投入精力对历代的碑刻文献进行全面的普查,作好通代的、断代的、分域的、分类的全面搜集工作,先把资料汇集起来。在此基础上,进行认真细致的、负责任的整理,比如辨伪、录文、标点,注释等。然后将整理的成果公布于世,以供各领域研究之需。出版物应该是释文(包括注释)与图版配套,以便研究时复核,并且还应该制作成光盘,或者在网上公布,以便资源共享。只有这项基础工作做好了,碑刻文献的研究才会得到基本保证。

(二) 研究缺乏系统性、科学性

过去的研究成果确实称得上丰富,而且不少研究在某些点上还比较深入,比如以石证史,以史验石的工作,碑刻各体书法的推广和研究,碑别字的汇集和考论等,在历史上都产生过重要的影响。研究的主要形式是碑铭题跋,其优点是保存了部分碑目,研究形式自由灵活,但缺点是没有保存碑刻原文,材料难以继续利用。研究没有系统性、科学性,驳杂无序,漫无条例,使得研究工作很难拓展,也很难深入。研究的理论、手段、方法也还不尽科学,不太合理。如何对过去的研究进行全面清理,作出实事求是的评价,认真总结历史经验教训,然后提出新的研究思路,设计新的研究计划,利用新的研究技术,以便让这份宝贵的文献得到最有效的利用,最科学的发掘,无论是在研究的内容上,还是研究的思路和研究手段、方法上,都还值得深入探讨。

(三) 碑刻文献学理论和碑刻文献学史的研究欠缺

碑刻文献学是古文献学的一个分支,古文献学研究的基本内容,一般原则、理论和方法,对碑刻文献学的研究都有用处,都可借鉴。但是,碑刻文献学又只是以碑刻作为研究对象,属于个别文献学。由于文献载体不同,形制不同,使用范围不同,承载的内容不同,文献形成途径不同,保存办法不同,流通方式也不同,因此应该有适合碑刻文献研究的一套理论和方法。诸如碑刻文献的类别,文献的制度,文献的保存,文献的搜集整理,文献的断代,文献的辨伪,文献的著录,文献的研究等,都应在全面调查的基础

上,进行深入细致的、切合实际的、具体有效的分析研究,作出必要的理论归纳和规律揭示,作为碑刻文献研究的门径,在方法论上切实指导对碑刻文献的具体研究与合理利用。

事实上,目前对碑刻文献研究的理论、方法,取得的成果,积累的历史经验,存在的教训等,至今也还没有进行系统的清理。历史上研究碑刻文献有影响的人物和它们的论著,金石学家(主要指碑刻)研究的彼此异同,相互影响,传承关系,各自的研究特色、风格,以及在碑刻文献研究中的历史地位,对中国学术的影响等,虽然已有一些零星的介绍,但也还没有进行全面的清理,更没有进行科学的描述和中肯的评价。

三、建立碑刻文献学的意见

(一) 碑刻学

专门以碑刻作为研究材料,考察碑刻源流演变,考订碑刻产生的时代,描述碑刻的形制体态,追踪碑刻流传、保存情况,辨别拓本真伪,研究文字书体,鉴赏碑刻书法,以及利用碑刻材料进行历史文化研究的学问,通称碑刻学。

古代碑刻属于广义的古器物。刘勰曾说:“碑实铭器,铭实碑文。”^①就其“铭器”、“碑文”之别,可以将碑刻的研究大分为两个分支学科:其一是铭器本体研究、玩赏和鉴别,属于器物学范畴。其二是释读碑铭,研究铭文内容,属于“金石学”范畴。碑刻学的研究于此二者都要涉及,而关注的重点在后者。

从学科史的角度考察,严格说来,一直到清代后期,研究金器文字和研究碑刻文字才开始出现分家的趋势。而直到二十世纪,碑刻的研究才真正独立出来,逐渐成为科学研究的又一个分支。从此,以碑刻文献作为研究材料,从事历史、考古、礼俗、典制、文字书体、书法艺术等方面研究的学问,被称为“碑版学”,简称为“碑学”。碑学还有一个狭义的法,就是在书法上,推崇碑刻书法的流派,也称“碑学”,它是与“帖学”相对的一个概念。随着研究领域的扩大,研究内容的深入,研究水平的提高,学界认为应该称为“碑刻学”,或者称“石刻学”,我们同意这样的意见。

不过,就这门学科研究的实际状况看,在历史研究、文字考释、书法鉴赏方面的成果是比较突出的,而在其他方面的研究则相当薄弱。客观地说,这门学科至今也还没有完全显现出来,或者说还没有完全建立起来。

^① 刘勰《文心雕龙》卷3《碑诔》,《四部丛刊》本。

(二) 碑刻文献学

碑刻文献学应该是在碑刻学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一个分支学科,又是古文献学的一个分支学科,以古文献中的碑刻文献进行研究,自然要涉及大量的碑刻文献材料,要涉及大量的碑刻学研究成果,还要涉及古文献的一般理论和方法,但是其重点应该侧重于对碑刻文献的理论探讨和规律的揭示,努力为碑刻学研究提供材料、经验和门径。我们认为,其内容主要应包括以下几个方面:

1. 碑刻文献产生、发展的历史。碑刻文献的产生与甲骨文差不多同时,这不仅是典籍传说,而且有实物证据,尽管已发现的上古碑刻实物并不多。碑刻文献的发展在东汉,而高峰则出现在唐代,并且延续到现在,人们用各种方式制作了大量的碑刻。各时代碑刻文献的状况和特征各不相同,应该全面揭示和科学归纳,碑刻文献发展演变的历史应该准确、细致地描述出来。

2. 碑刻文献的著录史。从西汉司马迁写《史记》,著录秦刻石开始,到郦道元《水经注》记录前代碑刻,再到宋代欧阳修的《集古录》、洪适的《隶释》,清代王昶的《金石萃编》、陆增祥的《八琼室金石补正》,再到孙星衍、邢澍《寰宇访碑录》,一直到现在大型碑刻拓本图录、碑刻录文的出版,为我们积累了丰富而宝贵的文献财富。碑刻文献著录的形式、数量、内容、体例,各时代著录的状况,承传关系,著录的得失,已有的经验教训等都应该研究。

3. 碑刻文献的发现、保存和流传。作为一种特殊的文献载体,碑刻有的从开始便植立于地面,直到毁灭;有的从开始树立,直到现在仍然立于地面;有的原先立在地面,后来被埋于地下,因偶然的机会有重新面世;有的一开始便埋于地下,由于种种原因,后来被发掘出来;有的碑刻实物至今仍存留在荒山野谷,风景名胜之地,有的碑刻、拓片收藏在各地图书馆、博物馆、文物保护单位,有的则仍然流失在民间,有的甚至在不同时代背景下流落国外等。碑刻的命运不同,埋藏地层不同,保存地点、保存方式不同,流传情况不同,其文献的价值也不一样。特别是历史上出土的碑刻,其现存状况尤其重要,必须清楚来龙去脉,才有利于碑刻的具体研究与利用。

4. 碑刻文献的制作。因时、因地、因人、因所书内容等情况不同,石材质地的选择,石面的整治处理自然不会相同。碑刻的制作人、制作工具、制作工艺、制作程序等,也各不相同。其间反映出时代特征、地域特征、等级特征、类别特征等,既千差万别,又有内在规律。碑刻文献学应在掌握大量材料的基础上,进行分析综合,追源溯流,提取其规律。

5. 碑刻文献的形式类别。由于时代不同,用途不同,制作方式不同,制作人群不

同,碑刻文献在形式上曾出现碑碣、石阙、摩崖、墓志、题名、造像、经幢、杂刻等很多类别。而类别不同,所记载的内容自然不会一样,文献的价值也各有侧重。历史上曾经有人进行过分类,但是由于分类标准不一,有的分类多到四五十类,仍然有交叉重合。怎样分类才科学合理,必须深入研究。

6. 碑刻文献的形制特征。不同类别的碑刻,其形制自然不同。同一种类别的碑刻,既有共同的构成成分,如墓碑有碑阳、碑阴、碑额、碑趺,墓志有志铭、志盖,经幢有幢座、幢身、宝盖等,都分别各有形制,各有名称;而落实到每一通碑石的具体形制,又各不相同。我们的研究,既要归纳共同成分的特征,又不能放过个别差异。

7. 碑刻文献的内容。将碑刻文献的内容分门别类地梳理,既有利于把握文献的全貌,又有利于文献的合理使用。还可以与传世文献以及其他出土文献相比较,发现其优劣得失,便于互相补充,互相校正,互相利用,无论是对于文献的整理,还是进行各学科的研究,都有好处。但是碑刻文献的内容实在太复杂,粗分还是细分,用什么标准分,都还没有展开认真讨论,因此在内容方面至今仍然是混沌的。

8. 碑刻文献的整理与辨伪。碑刻文献须要整理,才便于使用。基于碑刻文献的特殊性,除了古文献整理的一般理论和方法可以借鉴外,还应有适合碑刻文献整理的理论和方法。包括材料收集、断代、铭文释读、标点、注释,以及碑刻文献的出版形式体例等。碑刻多贗品,这是不争的事实。不论是碑刻原物,还是拓本、摹本,都有伪品。古文献学辨伪的一般原则、理论、方法,自然可以利用。而碑刻作伪又有特殊性,应比较全面地描述历史上伪刻的状况、特征,清理历史上出现的碑刻辨伪成果,总结辨伪的经验,以指导今后的碑刻辨伪工作。

9. 碑刻文献的研究成果及其评价。碑刻文献的研究,已经有一千多年的历史,研究人员多,成果门类多,研究样式多,数量十分庞杂。从研究的不同目的,不同视角,不同侧面揭示碑刻文献的研究价值,正确评价研究碑刻文献的重要人物和重要著作,清理前代的研究成果,总结研究经验,归纳研究方法,分析其存在的问题,对于学科史才有清晰的认识,才有利于站在学科研究的前沿观察和思考问题,选择恰当的切入口,从事各项研究。

10. 碑刻文献的专题研究。利用碑刻文献从事各方面的专题研究,是系统、深入、全面研究碑刻文献的必经之路。如历史研究,包括补史之缺、纠史之误、历史地理研究、经济史研究、政治史研究、边疆史研究、中外关系史研究、教育史研究等;经学研究,包括经学史研究、经典异文研究、纬学研究等;碑刻书法研究,包括书法史研究、书法比较研究、书法分类研究、碑书家派研究、碑书研究史的清理、刻工研究等;文化史研究,包括职官研究、礼学研究、姓氏谱牒研究、社会习俗研究、泛神崇拜研究等;宗教研究,

包括宗教碑刻的分类整理、宗教碑刻的内容清理、宗教派系研究、习俗与宗教关系研究等;碑刻文学研究,包括碑刻文体学、文章学、风格学、碑刻文学史等;碑刻语言研究,包括音韵研究、文字研究、词汇研究、语法研究、民族古文字研究等;科技研究,包括建筑史研究、水文水利史研究、医学及医学史研究、地震史研究、天文学及天文史研究、地理及地理测绘史研究、种植纺织史研究、工业技术研究等;艺术研究,除了书法艺术,还有画像艺术研究、造像艺术研究、装饰符号研究等。可见,不论是碑刻本体研究,还是利用碑刻文献从事各个领域的具体研究,其研究的空间都很宽广。

总之,碑刻文献产生的历史十分悠久,源远流长,伴随着历史的进程,从来不曾间断过,直到今天仍然在大量产生。碑刻文献具有鲜明的纪念性、标志性、张扬性特征,在所有铭刻文献中,数量特别庞大,内容异常丰富,而且今后一定还会有大量的新材料源源不断地出土,研究前景十分乐观。对它的研究,起步既早,研究成果也算得上丰硕,可供利用和借鉴的东西很多。当然,由于至今碑刻学和碑刻文献学还没有真正建立起来,不容易聚集力量,形成研究热点,更不容易凝聚研究的焦点,自然会严重影响对碑刻文献的全面、深入研究,使这份宝贵的文化遗产没能得到深入研究和充分利用,实在十分可惜。虽然有一批学者早就呼吁建立碑刻学,但是响应者并不多,并没有在学界产生太大影响。因此急需组织力量,投入人力、物力,全面搜集、整理碑刻的具体材料,搭起研究的平台,努力构建先进的、具有指导意义的理论框架,探索科学合理的研究方法,从不同视觉分门别类地展开全面研究。我们相信,经过学界的共同努力,建立起真正意义的碑刻学、碑刻文献学是完全可能的,这应该是历史的使命。

(本文作者毛远明,西南大学汉语言文献研究所教授)